

WILSON'S GHOST

历史的教训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言书

★ [美] 罗·麦克纳马拉 著
詹·布莱特
★★★★★★ 张立平 译

235

世界知识出版社

Wilson's Ghost

Copyright © by Robert S. McNamara and James G. Bligh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5
by World Affair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ffair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教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议书 / (美) 麦克纳马拉, (美) 布莱特著; 张立平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1

书名原文: Wilson's Ghost

ISBN 7 - 5012 - 2484 - 6

I. 历… II. ①麦…②布…③张… III. 外交政策 - 研究 - 美国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2675 号

图字: 01 - 2001 - 3888 号

- | | |
|------|-------------------------------|
| 书 名 | 历史的教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议书 |
| 作 者 | [美] 罗·麦克纳马拉 詹·布莱特 |
| 译 者 | 张立平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
| 网 址 | www.wap1934.com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排 版 |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
| 印 刷 |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印刷 |
| 开本印张 | 787 × 1092 1/16 14½ 印张 |
| 字 数 | 236 千字 |
|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
| 定 价 | 28.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罗·麦克纳马拉 1961—1968年任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8—1981年，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主要著作有《回顾：越南战争的悲剧和教训》（1995年）、《没有结局的争论：追寻越南战争的教训》（1999年）。

詹·布莱特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国际关系教授。1984—1990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任教。主要著作有《走在战争边缘的古巴：卡斯特罗、导弹危机和苏联的崩溃》（1993年）、《幻觉政治：重审猪湾入侵》（1998年）。

368

PAE-1712

译者简介

张立平 云南大理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思想文化研究所，获专门史（中西文化比较）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200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作品有《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获第五届社科院优秀著作三等奖）、《挑战布什——克里传》（合著）、《反对一切敌人》（合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合译）、《在希望与历史之间》（合译）、《国际关系理论指南》（合译）等，另有多篇有关美国政治及中美关系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

作者手记

我生于1916年，在旧金山长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威尔逊总统发誓“这将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1937年，当日本人开始对中国进行轰炸时，我所服务的一艘美国商船在上海靠岸，我目睹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哈佛当了三年（1940—1943年）教授后，“二战”期间我在陆军航空队服役，然后在1946年到福特汽车公司工作。1960年我辞去福特公司的总裁职位，接受了肯尼迪总统的邀请，担任他的国防部长。在我任国防部长一职的7年中，美国与苏联之间始终存在着战争危险。我参与了导致越南战争升级的令人痛苦的决策。1968—1981年，我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到过世界许多地方，那里部族暴力和杀戮威胁着整个地区的稳定。我以一个“圈内人”——一个参与者的角度目睹了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亲身经历促使我反思：20世纪出了什么错，导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进行彻底的大屠杀，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避免这样的事再一次出现？

1981年我从世界银行行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已经65岁。我退休后参加了有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一起进行的几十个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涉及我一直关心的问题：如何减少全球的贫困以及解决《历史的教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言书》（原书名《威尔逊的幽灵》）一书中所讲到的三个最根本的问题——大国冲突的风险、部族暴力和残酷杀戮、核灾难的危险。在这些研究项目中有我的最重要的合作者詹姆斯·G. 布莱特组织的一些项目，其中有一项是历时五年的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调查，它不仅涉及美国人，还有俄国人和古巴人。这项调查有重要的发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62年10月，核灾难险些发生。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另一个项目（已延长6年）中，美国人与北越前官员举行了七次会议，主要的成果是认识到双方错过了完全避免战争或者较早结束战争的时机，要吸取对将来有用的教训。

有一段时间，我想试着从我的经历中制定一套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

都能遵守的政策，目的是避免 21 世纪出现 20 世纪那样的战争大屠杀。

然而，尽管我曾是国内事务的一个实际工作者，但我绝不是国际关系的学者。我开始意识到，缺乏正规的训练和在某种程度上不熟悉该领域专家的著作，不可避免地会限制我所期望写出来的东西的质量及它被接受的程度。两三年前当我开始起草和重新起草本书的提纲时，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对于一个耄耋之年（80 多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没有在一个大学里担任专职教授的老人来说，论题的广度、每一个论题方面显然存在的大量文献、要将过去的教训通过现在与不确定的未来相联接的必要性——这看起来像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我怀着这些想法，询问了布朗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教授、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约瑟夫·奈以前的同事吉姆·布莱特，问他是否愿意考虑与我一起合写这本书。吉姆同意与我合作。

然后，我们与曾在 1995 年出版过我的越战回忆录《回顾：越南悲剧和越南的教训》和 1999 年出版了我与吉姆、罗伯特·布莱汉姆合著的续集《没有结局的争论：寻求越战悲剧的答案》的彼得·奥斯诺斯讨论了有关事宜。彼得说，他对由他的出版公司来出版这本书很感兴趣。随后，我与吉姆就开始将我们的想法凑在一起，并在定期会面中讨论这些想法。我们还雇了一位埃默里大学的能干的国际关系专家斯威特拉娜·萨伏兰斯卡娅博士，她利用大量的研究技术从许多信息源定期给我和吉姆发送有关我们的论题的新材料，我俩常常应接不暇。

有必要对于格式问题说句话。这本书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都是合著，我独自负责的个别段落除外，这些段落也对此作了清晰的标注。这些插入的部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中得来的。我希望通过我在 20 世纪参与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一些收获来影响 21 世纪的事件，从而会使本书更加充实。

我和吉姆在《历史的教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议书》一书中所阐述的思想不全是我们的发明，有些是很有争议的。但我和吉姆希望，我们在一个联合研究的项目中将想法放在一起，不仅会激发美国就如何使下一代生活在更加和平的世界里进行讨论，而且也会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讨论。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01 年 1 月

21 世纪宣言

选择生而不选择死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20 世纪对人类来说都是进步巨大的世纪。在发达国家中，人均寿命大为延长；实际上一般人都识字；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生产率都提高到以前梦寐以求的程度；人均收入同样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即使在欠发达国家中，人们的生活也开始改善。欠发达国家中人口尽管增加了三倍，人均收入（按 1999 年的美元来计算）还是从 200 美元增加到 1240 美元；识字率从 25% 提高到 74%；人均寿命从 40 岁延长到 65 岁。此外，全球贫困地区也有了可携带的饮用水，卫生条件、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虽然在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最贫困的人的生活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人类在 20 世纪发现了有史以来无数的痛苦、伤害和夭折的许多原因。

然而，20 世纪经历的战争血腥和破坏使以前所经历的相形见绌，约 1.6 亿人在暴力冲突中被杀害。还有，当我们进入 21 世纪时，我们拥有摧毁 20 世纪获得的一切的能力。在跨界战争、国内冲突和种族宗教冲突中，我们越来越显示出杀死同胞的效率；在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中，所有国家都同归于尽的危险依然悬在头上。

20 世纪的这一悖论——一方面是我们拯救、延长和改善生命的成功，另一方面是我们无力防止大规模的屠杀——集中地体现在 20 世纪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的生活中。这就是阿尔伯特·施瓦泽，他是 1952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非洲农村的医生、音乐家和学者、拯救和改善他的同胞生活的先锋。他在非洲实践的“尊重生命”的哲学与他的出生地——法国阿尔萨斯发生的毁灭性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一生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阿尔萨斯则两次成为战场，成千上万的人在此互相残杀，他们的武器改良技术与施瓦泽在西非救人和改善人的生活的医学源于同样的科学方法。

伍德罗·威尔逊是 20 世纪首先感觉到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根本变革、人类摧毁自己的数目就会更大的领袖之一，他形象地把具有更大毁灭力的灾难性战争称为“台风”。威尔逊的总统任期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及其后果（巴黎和会）。威尔逊认为，避免灾难的关键条件是，将减少杀戮摆在道德优先地位，用一种完全是多边的方法来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然而，他彻底失败了，他没有实现这些目标。所以，20 世纪游荡着威尔逊的幽灵：在 5000 万人被杀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充满核武器的恐惧和毁灭性的“代理人”战争的冷战中；在混乱、死亡和毁灭威胁下的后冷战时代的无数冲突中。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正常现象？为什么一些人杀死另一些人竟没有受到以人类获得更长的寿命、更有成就的生活为特征的 20 世纪总趋势的影响？我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特别是大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决策者——尚未将防止屠杀人类作为优先的核心任务。在《历史的教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言书》一书中，我们讲述了减少屠杀作为优先事项的基础和含义。减少屠杀不是惟一的优先事项，也许常常不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但应该是核心的优先事项。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申命记”告诫人们：“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从未有比减少人类杀戮的灾祸更重要的了，只有这样，我们现在才能享受生命之福，未来一代才能享受生命之福。

代译序

20 世纪威尔逊主义的梦想与幻灭

迄今为止，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血腥的世纪，1.6 亿人死于灾难性的冲突或战争。美国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性的悲剧之后，以总统的权威、学者的博识、传教士的精神、先知般的预言，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大屠杀而给世人开了一剂理想主义的药方——即后来以他的名字著称的“威尔逊主义”。在此后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上还是在外交政策的实践上，威尔逊主义都经历了跌宕起伏：每当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人就会对威尔逊主义充满梦想，而在新的战争到来之际又会对威尔逊主义颇感失望。那么，威尔逊主义是什么？它在理论上有哪些衍生物？在实践上有什么成就或失败？它对美国和世界分别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威尔逊主义的定义及其他

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由此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它具体体现在 1918 年 1 月 8 日威尔逊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主要强调下列目标的实现：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美国外交四项原则（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

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¹等，完善了他关于持久和平的设想。威尔逊主义显然想用集体安全体系的“快刀”斩断欧洲古老均势体系这堆“乱麻”，他好像要告诉欧洲人：“从今以后，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各国的安全不应依靠军事同盟，而应以集体安全为保障；外交活动也不宜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公开地达成公开的协议’。”²

根据威尔逊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可以得出下列看法：(1) 他的人性观是基于自由主义的人性善；(2) 他承认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且认为和平只能建立在经过考验的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3) 在国际层面上，他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可以用法律和制度来限制武力的使用；所有国家的政府将宣战权交给多边组织，武力的使用必须得到多边的同意或授权；(4) 类似“勿杀生”的伦理道德、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突出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律令，决策者将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³

威尔逊主义的思想来源主要有：(1) 19世纪主导欧洲和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古典自由主义有重商主义的倾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会致力于和平，因为战争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发展。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避免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利益的和谐性会引导它们寻求集体安全，“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律和 International 组织，应当也可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架构”。(2) 美国的传教士精神或说“天命运观”。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人民是上帝拣选的子民，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义务，推而广之即是向世界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其结果就是实行扩张主义或干涉主义。威尔逊认为美国在集体安全体系中肩负领导责任。他在1919年7月10日对参议院的讲话中说：“惟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拒绝别人赋予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世界对我们的信心。”⁵ (3) 美国文化中的“例外论”⁶。美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是自由之地、希望之乡，是理想世界的缩影。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中，杰斐逊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源于“例外论”。如果说杰斐逊主义是“洁身自好”、确保美国不要世界化的话，那么威尔逊主义则是“己所欲，施于人”，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4) 18世纪启蒙哲学。启蒙哲学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在国际关系中，人道的目标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

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政策常常奉行如下这些准则：第一、作为国内治

理形式，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度、专制制度更好；在世界政治中，民主国家能够成为美国更好的、更可靠的伙伴；第二、在国外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实际需要；第三，防止战争。热衷消除战争根源，支持和平运动、裁减军备、削减防务预算。⁷

按米德的说法，20世纪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成分（理想主义成分）就已存在，当然那时它还没有被命名为威尔逊主义。⁸美国时常显示出“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和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该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关注它们的国内政策”⁹，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传教士在世界上的活动中，但往往为外交史家所忽视，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军人（打仗）和商人（经商）的活动。¹⁰传教士的活动属于民间性质，虽然也得到官方的协助、支持和保护；而官方外交中正式支持世界上的民主并不很多（如支持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力有限。1823年美国宣告门罗主义后，美国自动将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活动半径划定在西半球，威尔逊主义的效力和威力也仅限于此。威尔逊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远不如汉密尔顿主义的影响大。但进入20世纪后，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上升为世界第一，美国又成功地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会议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理想主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威尔逊主义的宣布是在合适的时间（胜利之后）、合适的地点（讨论战后安排的会议）、合适的人（帮助赢得胜利的最有实力的大国总统）所说的合适话语。此后，威尔逊主义逐渐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由于美国主导了20世纪，威尔逊主义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的理论及实践息息相关。

威尔逊主义的公式可以简化为：（1）道德律令——道德应当是一切外交政策的出发点；（2）多边律令——多边主义应当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基本手段；（3）民主律令——在美国领导下实现世界的民主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4）民族自决律令——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统治形式。

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应当将威尔逊主义与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区别对待，前者是一种外交思想或理论，后者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他执政时期所采取的外交政策。

威尔逊主义的理论衍生物

20世纪70年代的相互依存论而建构的新自由制度主义、80年代的民主和平论、90年代的全球主义、新干涉主义可以说都是威尔逊主义的理论衍生物。

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在经济领域，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美元危机而解散，1973年因中东石油输出国对西方国家搞“禁运”而引发了石油危机，发达国家的经济均受这两起事件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了“滞涨”。这不能不引发国际关系学者的思考。此前，人们容易想当然地以为“相互依存”和国际合作主要是存在于西方世界。石油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樊篱。(2)在政治领域，70年代正是尼克松、基辛格与苏联大搞“缓和”的时代，美苏冷战对抗烈度有所下降，这使人们重又产生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的威尔逊式的幻想：美越通过谈判达成《巴黎协定》(1973年)；欧安会的召开达成了《赫尔辛基协定》(1975年)；美苏通过谈判达成战略平衡；美中通过谈判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问世，此书既是对时代的反思，又是对国际经验的总结，它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成形。新自由制度主义是新时代的威尔逊主义，它对传统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认为在一个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看待国际关系的视角也应当发生变化：首先，国家虽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已不是惟一的行为体，它的地位和作用在下降，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在上升；其二，作为实力主要组成部分的军事力量已不再是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的核心力量，经济因素上升；主导国际关系中的“高度政治”(安全和战略)要和传统上的“低度政治”(经济、环保、卫生、反毒和走私等)平分秋色；其三，相互依赖产生了国际合作的需求，而合作需要靠“汇聚一系列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描述性工具”¹¹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égime)来进行。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国际机制首先在经济领域或功能性领域发挥效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海洋领域、国际原子能机

构、国际海洋法等。新自由制度主义如威尔逊主义一样乐观地相信全球秩序可以在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的约束下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还包含着这样一层含义：经济的相互依存会导致政治的相互依存，经济上的合作产生“共赢”；政治上可以通过建立互信机制来进行合作，从而消除彼此的猜忌、疑虑和敌意，降低战争的危险，同样可以产生“共赢”。

可以理解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在80年代遭受挫折，原因是：（1）1979年肯尼斯·华尔兹的《国际关系理论》¹²问世，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作为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回应和反拨。（2）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非洲的安哥拉游击战士、策动伊朗霍梅尼革命等等标志苏联开始大规模地侵略扩张，也预示着“缓和”的终结。（3）保守的里根在1980年大选后入主白宫，发誓要将苏联的侵略扩张推回去，这是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期。战略力量、军事实力又夺回其在美国外交中的显赫地位。1987年倡导“改革”和“新思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表明苏联开始在美国咄咄逼人的实力面前让步。

冷战后，时代的变化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注入了更多活力：（1）约瑟夫·奈1991年《注定领导：论美国力量性质的改变》¹³一书表面上是对“美国衰落论”的回击，实际上也完善了他们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理由是他提出的“软力量”一说淡化了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强调美国在“软力量”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国际机制中的巨大影响力；一句话，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实现对世界的领导或霸权。（2）美国政权的更迭，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后连续当了8年总统。克林顿时期，安全议题尽管很重要，但已与经贸议题、人权议题相提并论。在美国的外交中，“低度政治”开始浮出水面，与“高度政治”竞争关注和影响。（3）最重要的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迅猛，世界性的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名目繁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间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增长。与此同时，各地区出现了一体化趋势，最为典型的当然是欧洲一体化程度加深，欧元的诞生表明欧洲不仅实现了市场一体化，而且也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并且正朝着外交/防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民族国家在欧洲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在此情况下，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提出的“全球主义”、“国际治理”、“全球共同体”绝不是空穴来风¹⁴。

民主和平论。1986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对自由主义与世

界政治思考后提出了“民主和平论”的主题，即认为民主国家很少或不易打仗，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和文化规范的自律。¹⁵就理论而言，“民主和平论”显然承继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并与威尔逊主义“为民主提供安全的世界”相关联；就经验来说，“二战”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开战的事实似乎使“民主和平论”不证自明，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公理”。如果说，对于欧洲人来说，“民主和平论”只是自由主义和平观的一种理念的延续；对于美国人来说，“民主和平论”却是行动的指南，这在冷战后更是如此。¹⁶“民主和平论”其实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政策学说，它的幸运就在于生逢其时。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总统，民主党的克林顿要“扩大民主的和平区”；“民主和平论”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海外干涉、“国家建设”的一把尚方宝剑。“民主和平论”虽然设想很好，但常常会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效用问题，“民主和平论”仅限于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即那些兼备两个条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国家；二是国内政治国际化的问题，它泯灭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分界线，以为两者之间是直通车；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可以像国内的利益冲突一样通过制度、法律来解决；但国际政治的现实依然是无政府状态。“二战”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应归因于美国霸权的存在和对盟国实行了战略性的节制。现实主义者当然不会接受“民主和平论”，认为它不过是威尔逊主义在新时代的翻版，仍然是一个乌托邦。

全球主义。有人认为，全球主义是理想主义、和平主义（信仰人性善、道德、法律、集体安全、永久和平）；全球主义是自由主义（信仰普遍主义和进步主义，认为一切社会与政治制度都是可以改造的）；全球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资本、贸易、市场的全球化）；全球主义是以人类为本、以世界为体，区别于国家主义（生态政治属于此类）。¹⁷全球主义虽然古已有之，但真正的全球主义应该说是在后冷战时代才开始，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的盛行使国际治理或全球治理提上议事日程，全球社会的概念着眼于培养全球性的公民。全球主义的理论有三个难解的问题：（1）世界政府的问题。没有高居于民族国家政府权力之上更高一级的世界政府，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否能超越各个国家、民族、集团的利益？（2）认同问题。有多少人认同于全球社会的价值观、伦理观或者自认为是世界公民，有多少国家的政府愿意放弃国家主权？¹⁸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全球社会被现实主义者称为“虚幻的”而不是现实的。¹⁹（3）全球治理问题。是否靠国际组织、区

域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就能把全球方方面面的事情办好？迄今为止，“低度政治”的国际治理比较活跃，而涉及“高度政治”的战略、安全议题，国际治理就出现了缺位或无效，如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防止1995年卢旺达大屠杀；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也没有发挥实际效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是暴露了全球治理的缺陷。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谁拥有最强的军事力量谁就最有发言权。而即便是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也不过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更何况还无法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20世纪最后十年，新一波的全球主义的复兴完全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1997年之前，人们欣喜地看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甚至乐观地拥抱全球化，以为经济全球化将会带来政治全球化和世界秩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揭示了全球化带来的另一面（负面）：金融全球化使某些民族国家的货币政策即使不是陷入无效，也是陷入失控状态。此外，全球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对于弱势群体的伤害尤其明显：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时，全世界无产者却在分裂！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有时甚至是“超国民”待遇；同时为了让资本家有利可图，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竞相压价，只有工薪低才能有工作机会！而发达国家的工人由于最低工资法的“保障”，等待他们的是工厂外迁、失业在家；原来以制造业为主的繁荣兴旺的城市现在一片衰败：废弃的工厂、破败的社区、恶化的环境、怨怒的居民等等。2000年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开会时，国际上一些反全球化者冲进会场，表示抗议；2003年，世界贸易组织在布拉格召开年会时，同样引来了全世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即使是全球化的发动者美国由于2001年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对全球化的热情也在降温。“9·11”恐怖袭击更是证明了全球化中最坏的一面：当经济全球化时，恐怖网络也在全球化！至此，大多数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好东西！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都是有弊有利的。在我看来，理想中的全球社会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大同世界”；而现实中的全球社会实际上还处于一个全球化的进程。

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指基于人权或人道的理由而对一个国家实行武力的干涉，目的是迫使被干涉国家改变政策、制度甚至政府形式，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因此这种军事干涉又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它不同于过去的干涉主义，过去的干涉主义军事意味浓厚，主要目的是为了一个国家战略利益或安全利益，并不特别强调人道的理由或

政治目标。显然，“新干涉主义”体现了威尔逊主义的道德律令，突出了道德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新干涉主义存在的问题是：何时何地地进行何种干涉？由谁干涉？怎样干涉？国际社会不可能对任何一次人道主义灾难都进行干涉，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共发生了10次严重冲突，它们发生在：苏丹、卢旺达、安哥拉、索马里、布隆迪、利比亚、伊拉克、塞拉利昂、波斯尼亚和俄罗斯的车臣地区，这些国家本应是人道主义干涉的首选，但它们没有被美国干涉；科索沃和海地，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克林顿政府对这两个地方进行了干涉，主要是因为除了人道的考虑外，这两个地方对美国来说同时还有战略的利害关系。²⁰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是有条件的：做出干预决定的领导人至少做过类似于经济学的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即干预不会为了拯救一部分人的生命而付出更多生命代价！对于人道主义干涉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最好交给联合国来干。然而，联合国本身没有自己的军队，即使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有赖于各国提供，此外，联合国的预算也有赖于各主权国家分摊，干涉与否也需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来决定，而且每一个常任理事国均有否决权。从联合国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来看，要及时有效地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绝非易事，除非是受到当事国的邀请，如在东帝汶。在一些冲突地区，联合国派出了维和部队；但对一些流血冲突，联合国却无能为力。这时候一些强势国家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者就要求该国出兵进行干涉。最典型的是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解体后发生的波黑冲突、科索沃事件。而对于某些国家的干涉行为又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抗议，原因是它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不具有合法性。此外，干涉的目标是使交战双方停火，还是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民主政府，还是仅仅为处于冲突下的平民提供起码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都是有待定义的。有时人道主义干涉可能适得其反，好心办坏事。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情况下应该干涉，什么情况下不应该干涉。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依具体情势而定。

“新干涉主义”的产生背景有三：（1）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是国际人权法的完善和扩展。《联合国人权宣言》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两个文件都承认国家不能从法律上剥夺人权。二是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对违犯人权的批评和监督。“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在批评各国政府违犯人权行为方面充当先锋。人权理论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提高，甚至有人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说，即一个国家的主权并

不是无限的、无条件的，只有当它能够对其公民提供人权的宪法保障，维护人权，它才有资格享有“主权”，否则它的“主权”就是有限的；当其政府系统地、有组织地“侵犯”人权时，它就不能享有国际关系中“不干涉原则”的豁免，甚至连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表示：“现在的‘国家’被广泛理解为服务于民众、而不是管制民众的工具，与此同时，随着‘人权’被赋予的内含不断更新和扩大，个人主权——我指的是被庄严地写进《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公约中的每个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也越来越受重视。当我们今天翻看《联合国宪章》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它的目的是要保护每一个人，但不包括那些破坏人权的人。”²¹“人权高于主权”说颠覆了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国际政治中流行的主权论。它在受到西方国家多数人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强烈批评或抵制，因为被干涉国家基本上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2)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发展，有线电视新闻的即时传播缩小了空间的距离，使千里之外发生的暴行能够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引起人们良心的普遍不安和道德关怀。而国际合作使得国际社会能够遏制种族灭绝或种族暴行。(3)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冲突或战争大多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或地区小国之间，原来被东西方对峙掩盖的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边界纠纷或历史冤仇纷纷抬头，成为冲突的主要因素。对于这些冲突坐视不管还是进行干涉成了国际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

“新干涉主义”的效用：在科索沃战争后，有人又将“新干涉主义”戴上“克林顿主义”的帽子，以为科索沃战争将为美国今后进行海外干涉提供一个先例。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克林顿主义”戛然而止，以国家战略和安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布什主义”的干涉取代了以人道为目的的“克林顿主义”的干涉。“新干涉主义”何其短命！

威尔逊主义以上的理论衍生物，实际上是在新时代对威尔逊主义的理论细化和创新：“新自由制度主义”突出了多边律令，“民主和平论”强调民主律令，“全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着重道德律令。

威尔逊主义的政策和实践

国际联盟。在威尔逊的不懈努力下，第一个体现威尔逊主义的组